

试论清代宜荆地区宗族祠堂发展实态

白冰洋

提 要：在清代宜兴荆溪地区，宗族祠堂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兴起、持续发展、掀起高潮、跌入低谷、再次掀起高潮的发展态势。宜荆地区宗族祠堂的发展态势，受到朝廷政策和地方需求两方面的影响。而族人积极捐资支持则是祠堂存在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关键词：清代 宜荆地区 宗族 祠堂

以往学界对于清代苏南宗族的研究，往往集中于苏南以东地区的义庄宗族，而长期忽视了对苏南西部地区宜兴、荆溪^①等地的祠堂宗族。本文通过探讨清代宜荆地区宗族祠堂的建造时间、数量、分布等方面情况，还原清代宜兴荆溪地区宗族祠堂发展实态，以期引起学界对这一地区宗族研究的关注，并为以后的研究打下基础。

清人钱大昕曾说：“祠本宗庙之祭，秦汉以降，神祇群祀通称焉。故祠于坛，谓之祠坛；祠于城，谓之祠城；祠于堂，谓之祠堂。……祠者，祭之名，而非祭之所。……后人习焉不察，直以祠为祀神之所矣。古礼，大夫、适士、官师俱得立庙，而以宗子主祭，故有百世不迁之宗。三代以后，仕者不世禄，大宗不能收族而宗法废，虽贵为大夫，犹祭于寝，于是有祠堂之设，以祀其祖，俾族氏不忘其所自发，犹有宗法之遗意焉。”^②由此可知，祠本指宗庙之祭，是秦汉以后神祇群祀的通称，而最初的祠堂一词则是祠于堂的意思。后来祠由祭祀的名称变为祭祀的场所，祠堂也成为祭祀先祖之地。而宗祠的兴起源于北宋时期建于居室之侧的家祠堂，这种家祠堂是一种家庙制度影响下的家庭祭祖场所。后来程颐提出的士大夫可以祭祀始祖和先祖的主张为宗族由小宗向大宗发展及建大宗祠提供了理论依据，到了南宋时期出现了宗祠，但当时只是个别现象，民间真正大规模建造祠堂始于明代中后期，并在清代继续。^③清代宜荆地区宗族祠堂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快速发展起来。

一 宗族祠堂的建造时间

宜荆地区有史可考的建造时间最早的祠堂，是东汉年间为纪念蒋澄所建造的汉函亭乡侯祠，然而这只是为了纪念蒋澄而建造的专祠，不是后世所谓的宗祠。^④宜荆宗族祠堂的建造大约在南宋时期才开始出现，此时扶风许氏曾建有“家庙”^⑤。但是，南宋时建祠堂很少，元代所建也不

① 宜兴、荆溪历来同属宜兴县，但在清代雍正年间从宜兴析出荆溪，两县分治并存续到清代结束，但是在历史上的更长时期内，宜兴是一个完整县域，今天依然。因此本文将宜兴、荆溪两地放在一起考察。

② 钱大昕：《钱氏祠堂记》，《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64册，第191页。

③ 参见常建华：《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8—90页。

④ 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宜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宜兴文史资料》第6辑，1984年编印，第102页。

⑤ 许继德主修：宜兴《扶风许氏宗谱》卷2《新建祠堂记》，民国37年（1948）刊本，宜兴市档案馆藏。

多，基本上处于萌芽状态。明代前中期祠堂发展较宋元时期稍快，成化年间陈氏建祠^①，弘治年间徐氏建祠^②，但是发展总体上依然较为缓慢。到了嘉靖年间，尤其在夏言上疏以后，宜荆地区宗族祠堂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嘉靖年间储氏^③、万历年间陈氏^④、史氏^⑤和董氏^⑥都陆续建立祠堂。但是，这些建于清代之前的祠堂，有很多毁于明清鼎革之际的战火。

进入清代以后，宜荆地区祠堂获得了大发展，直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祠堂发展态势可以从下表略知大概。

表 1 清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宜兴荆溪宗族祠堂的发展情况表

宗族祠堂	建成时间	资料来源
扶风许氏	康熙五十九年（1720）重建	许继德主修：宜兴《扶风许氏宗谱》卷 2《新建祠堂记》，民国 37 年（1948）刊本，宜兴市档案馆藏
胥井董氏宗祠	康熙年间重建	董秉清主修：《宜武董氏合修家乘》卷 17《祠墓志·胥井祠制》，民国 16 年刊本，美国盐湖城犹他家谱学会藏
胥井董氏分祠	乾隆三十六年（1771）建	
荆溪任氏大宗祠	清雍正五年（1727）建，毁于太平天国时期，同治五年（1866）重建	清任道镕纂修：《荆溪任氏家乘》卷 2《任氏大宗祠记》《重建大宗祠碑记》，光绪十五年（1889）刊本，美国盐湖城犹他家谱学会藏
吴家圩吴氏祠堂	清乾隆九年建，毁于太平天国时期，民国 26 年重建	吴之藩纂修：宜兴《吴家圩吴氏宗谱》卷 1《报本堂记》《重建祠堂记》，民国 26 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
粉里朱氏宗祠	清乾隆二十六年建，毁于太平天国时期，光绪九年重建	朱良英主修：（宜兴）《粉里朱氏宗谱》卷 12《重建粉里宗祠志》，民国 29 年刊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藏
薛氏西公祠	清乾隆三十年建，毁于太平天国时期，民国 16 年重建	萧景翹纂修：宜兴《薛氏宗谱》卷 1《重建祠堂记》《重建祠宇记》《重建西公祠记》，民国 34 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
薛氏东公祠	清嘉庆初年建，毁于太平天国时期，光绪二年重建	

① 参见陈世球主修：宜兴《陈桥陈氏宗谱》，民国 37 年刊本，美国盐湖城犹他家谱学会藏。

② 参见徐氏世德堂编：宜兴《世珍集》卷 3《新建祠堂记》，光绪三十三年（1907）刊本，宜兴市档案馆藏。

③ 参见储锡初主修：宜兴《官林储氏分谱》上篇《储子长公创建分祠记》，2010 年刊本，南京图书馆藏。

④ 参见陈诏卿主修：宜兴《陈氏宗谱》卷 67《重建大宗祠碑记》、卷 70《耕隐公碑记》，民国 6 年（1917）刊本，上海图书馆藏。

⑤ 参见史茂春主修：宜兴《东岸里史氏宗谱》卷 1《史氏建祠记》，民国 37 年刊本，宜兴市档案馆藏。

⑥ 参见董秉清主修：《宜武董氏合修家乘》卷 17《祠墓志·胥井祠制》，民国 16 年刊本，美国盐湖城犹他家谱学会藏。

(续表)

宗族祠堂	建成时间	资料来源
萧塘贾氏家庙	清嘉庆十八年（1813）建， 毁于太平天国时期，光绪十六年重建	贾洪淞主修：宜兴《萧塘贾氏续修宗谱》卷 2《新建分祠记》《重建家庙记》，民国 24 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
岳氏知义庄祠堂	清道光五年（1825）建	岳金龄主修：《宜兴岳氏宗谱》卷 4《知义庄岳氏祠堂记》，民国 29 年刊本，南京图书馆藏
缪墅杨氏分祠	清道光十八年建	杨阿大主修：宜兴《杨氏宗谱》卷 1《缪墅杨氏分祠记》，民国 26 年刊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藏
东岸里史氏在城宗祠	清咸丰二年（1852）建， 毁于太平天国时期，同治八年重建	史茂春主修：宜兴《东岸里史氏宗谱》卷 1《重建在城宗祠记》，民国 37 年刊本，宜兴市档案馆藏
茗岭蒋氏祠堂	清咸丰六年建	蒋惟高主修：宜兴《茗岭蒋氏宗谱》卷 4《忠愍公建祠记》，宣统元年（1909）刊本，宜兴市档案馆藏
和渎许氏祠堂	毁于太平天国时期，清同治五年重建	许云昌、许炳庚主修：《宜兴和渎许氏宗谱》卷 1《重建祠堂记》，2012 年刊本，南京图书馆藏
陈氏大宗祠	毁于太平天国时期，清光绪十四年重建	陈诏卿主修：宜兴《陈氏宗谱》卷 67《重建大宗祠碑记》、卷 70《耕隐公碑记》，民国 6 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

表 1 尽管只是清代宜荆地区部分祠堂的建造情况，但是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不仅毁于明清鼎革之际战火的祠堂在入清以后获得了重建，很多宗族还建立了新祠堂。尤其是清代中期，宜荆地区宗族祠堂的发展出现一个高峰期。但是，从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南京至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太平军与清军在苏南西部地区反复交战，宜荆地区原有宗族祠堂大多毁于战火之中。战乱导致宗族无心也无力建祠，清代中期掀起的祠堂发展高潮因此跌入低谷。

从上表还可以发现，虽然太平天国战争给宜荆祠堂带来毁灭性打击，严重阻碍了祠堂的发展，然而在战争结束以后，毁于战火的祠堂陆续得以重建。宜荆地区不仅在太平天国运动后出现了重建祠堂的热潮，新建祠堂的发展也很迅速。这可以通过高塍镇祠堂的建置作进一步了解。

表 2 清代宜荆地区高塍镇清末部分祠堂建置一览

宗族祠堂	建置时间
杭上马坞里王氏东分祠	同治六年（1867）重建
后庄村北王氏西分祠	同治七年再建
胥井杉木桥北陈氏宗祠	光绪三年（1877）建
胥井欧氏宗祠	光绪五年建
胥井定坐河陈氏宗祠	光绪二十二年建
湖陵村蒋氏宗祠	光绪二十六年建
邱新村吕氏宗祠	光绪三十四年建
蒋庄村西蒋氏宗祠	光绪年间建
上新渎河西	光绪年间建
滕东村顾氏宗祠	民国 13 年（1924）建
赋村邵氏宗祠	民国 21 年建

资料来源：《高塍镇志》编纂委员会：《高塍镇志》，方志出版社，2005 年，第 393—396 页

在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以后，高塍宗族祠堂普遍进入恢复发展期，宗族开始重建在战争中被毁的祠堂，有很多宗族新建祠堂，形成建造祠堂的第二个高峰期，而且到民国时期还在延续。

清末宜荆地区祠堂的恢复发展不仅在高塍如此，在周铁镇也一样。同治年间，周铁分水村周氏建祠堂，光绪年间彭干村陆氏、龙亭村姚氏、棠下村谢氏分别建祠堂。甚至到了民国时期，旧渎村周氏、前彭村费氏、准马村瞿氏等还在继续建祠。^①由此可见，清末宜荆宗族祠堂的发展虽然受到太平天国战争的严重打击而陷入低谷，但是战后祠堂迅速恢复发展，再次掀起高潮，甚至到民国时期还在继续。

清代宜荆地区祠堂的发展过程从整体上看，大致呈现兴起并持续发展、掀起高潮、跌入低谷、再次掀起高潮的发展态势。

二 宗族祠堂的数量及分布

为了进一步说明清代宜荆地区宗祠的发展状况，有必要掌握祠堂的分布。笔者将搜集到的宜荆部分乡镇的祠堂分布情况列表如下（见表 3）。

表 3 宜荆部分乡镇祠堂数量统计表

单位：座

	祠堂数量	资料来源
高塍镇	96	《高塍镇志》编纂委员会：《高塍镇志》，方志出版社，2005 年，第 393—396 页
周铁镇	87	《周铁镇志》编纂委员会：《周铁镇志》，凤凰出版社，2008 年，第 487 页

① 参见《周铁镇志》编纂委员会：《周铁镇志》，凤凰出版社，2008 年，第 487—491 页。

(续表)

	祠堂数量	资料来源
官林镇	78	《官林镇志》编纂委员会：《官林镇志》，新华出版社，1998 年，第 296 页
杨巷镇	67	杨巷镇人民政府：《杨巷镇志》，方志出版社，2003 年，第 298 页
丁蜀镇	23	江苏省宜兴市丁蜀镇志编纂委员会：《丁蜀镇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2 年，第 678—679 页
和桥镇	18	《和桥镇志》编纂委员会：《和桥镇志》，1990 年编印，第 20 页
张渚镇	10	《张渚镇志》编纂委员会：《张渚镇志》，1991 年编印，第 57 页

说明：1. 丁蜀镇宗祠数量多达几十座，其中较大的宗祠有 23 座
2. 本表是笔者根据原始数据统计而成

仅从表 3 来看，高塍镇祠堂最多，共有 98 座，而最少的张渚镇也有 10 座。虽然宜荆地区各乡镇祠堂数量不一，但分布广泛。宜荆宗族普遍建置宗祠，而且有些宗族还不止一座宗祠。以周铁镇为例，周铁镇共有 87 座宗祠，其中周氏 9 座，丁、王氏各 8 座，吴氏 7 座，张氏 6 座，陈氏 5 座，陆、徐氏 3 各座，沈、冯、马、戴、许、刘、李、胡氏各 2 座，钱、岳、万、尹、闵、姚、夏、潘、费、谢、卢、宋、唐、钟、欧、庄、裴、瞿、杭、蒋氏各 1 座。^① 周铁镇共有 297 个姓氏，而以上只是世居周铁宗族所建宗祠的数量。据民国 25 年（1936）六月保甲户口总复查统计，宜兴全县共有祠堂 2583 座，其中绝大部分建造于清代。^② 另据 20 世纪 80 年代常州武进乡志记载和实地走访调查，常武地区原有 1600 座以上的大小祠堂。^③ 但是，其数量也比不上宜荆地区。清代安徽徽州是宗祠发展较快和分布较为密集的地区之一，但是从休宁县的 295 座^④和绩溪县的 340 座^⑤来看，徽州县域的宗祠数量也远远比不上宜荆地区。清代宜兴荆溪宗祠之多、分布之广泛在整个苏南地区乃至全国都十分罕见。

三 宗族祠堂发展态势的原因分析

清代宜荆地区宗祠发展呈现出这样的态势主要受到以下几种因素的推动。

首先是明清两代政府政策的支持。明代前期，政府要求士民遵照朱熹《家礼》的规定，建家祠祭祀上至高祖的四代神主，但是民间祭祀实际上并没有为政府政策所限制，而是沿袭元代建宗祠祭祀始祖的传统，家祠继续向宗祠转化。到了嘉靖十五年（1536），礼部尚书夏言奏请“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祀始祖”，得到了明世宗的允准。明世宗以后的诸位皇帝虽不承认嘉靖十五年令，但是对民间建宗祠采取了默认态度。^⑥ 以夏言改革宗法方案的提出为契机，宗祠在全国范围

① 参见《周铁镇志》编纂委员会：《周铁镇志》，第 487—491 页。
② 参见江苏省宜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宜兴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773 页。
③ 参见周逸敏、朱炳国：《常州祠堂》，凤凰出版社，2012 年，第 2 页。
④ 参见道光《休宁县志》卷 20《氏族·祠堂》，凤凰出版社，2010 年影印本，第 38—54 页。
⑤ 参见绩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绩溪县志》，黄山书社，1998 年，第 377 页。
⑥ 参见〔日〕清水盛光，宋念慈译：《中国族产制度考》，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6 年，第 83 页。

内得到了广泛的推广。而宜荆地区的宗族在明代中期开始大规模建造祠堂，不得不说是受到了夏言改革方案的影响。

清承明制，而且从清顺治开始，继续在民间宣讲明代的《圣谕六条》，要求“孝顺父母”“恭敬长上”，推行以孝治天下。康熙帝根据《圣谕六条》拟定《圣谕十六条》，令士民“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把“孝弟”作为施政要务，移风易俗的根本。雍正帝即位后，除了继续宣扬《圣谕十六条》外，还将其演绎为《圣谕广训》，并对“笃宗族以昭雍睦”进行具体阐述，倡导宗族“立家庙以荐烝尝”，并下令“颁发直省督抚学臣，转行该地方文武各官暨教职衙门，晓谕军民生童人等通行诵读”^①。此后《圣谕十六条》及《圣谕广训》被清政府奉为治国教化之圭臬，广为宣传。乾隆帝在即位第二年（1737）就下令：“传谕各省督抚率有司将圣谕实心宣讲，多方劝导，务使远乡僻壤之民共知遵守是训是行。”乾隆二十三年又规定：“嗣后宣讲圣谕务须实力奉行，除每月朔望二次宣讲外，或于听讼之余及公出之便随时加以提命，或不妨以土音谚语敬谨诠释，明白宣示。”^②可见，乾隆帝对宣讲《圣谕十六条》及《圣谕广训》非常重视，不仅要时时宣讲，还要宣讲者因地制宜进行解读使得百姓明白。乾隆之后的清代皇帝无不重视对《圣谕十六条》及《圣谕广训》的宣讲，并将其视为教化百姓、改良地方风俗的有力工具。此外，在乾隆二十一年，清廷还批准了江苏巡抚庄有恭奏请并经刑部议复的首个有关保护宗祠的规定，并且附入《大清律例》。^③正是清代政府的重视和在政策上的支持、推动，为宗祠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环境，使得宜兴荆溪地区宗祠在遭受明末清初战争打击之后，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并在乾嘉年间兴起一次建造高潮。

其次是社会形势的影响尤其是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宜兴荆溪地区修建祠堂的热潮在明代中后期兴起不久就受到明清易代之时战争的影响，而且许多宗祠还毁于战争之中。如上文提及的宜兴扶风许氏、胥井董氏等。而兴起于乾嘉时期的这股建祠高潮同样在太平天国兴起之后被打断，并且使得当地的宗族势力遭受沉重的打击，宗族人口大量伤亡，甚至许多宗支断绝，宗祠也毁于战火之中。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南京周边地区的宗族士绅在地方官府的领导下组织团练与太平军对抗。宜兴吴光远从咸丰三年开始，联合“其兄卿与邑绅督团严防，数年不懈”^④。咸丰十年（1860）四月太平军进攻宜兴荆溪，当地宗族更加响应官府的号召开展积极抵抗。张凤池为千总衔武生，宜兴城陷时“年八十有八”，“纠族众拒杀”。蒋益元时年80余，其族人蒋浩、蒋纪常“结团御贼”，蒋益元“悉出家资助饷”。汤新惠为例贡生，在咸丰十年春太平军进攻张渚时，和族人邦荣、义明、铭寿等人“按亩出资，按户出丁，得千余人据险自守”^⑤，达3月之久。吴锦浩在宜荆县城被太平军攻占后，“散财购械，结乡团事备御，遥应许鸣邕于乐城桥，继应丁锦书于显德寺，拒守烟山，又赴潘家坝助战”，同治二年（1863）三月战死。其乡团中先后战死者有47人，而吴姓族人就有39人。^⑥宜荆地区宗族在与清政府联合抵抗太平军时，自身遭受巨大损失，除了财产等损失外，人口伤亡亦重，据时人统计，死难绅民共有7700余人，死难

①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15页。

②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八），第331—332页。

③ 参见〔日〕中岛乐章：《宋代至清代同族共有资产的法律性保护》，《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卷，第135—136页。

④ 民国《光宣宜荆续志》卷10《人物志·忠节补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第582页。

⑤ 参见光绪《宜兴荆溪新志》卷8《人物·忠节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第237页。

⑥ 参见民国《光宣宜荆续志》卷10《人物志·忠节补录》，第583—584页。

妇女约有3468人。^①另有数据显示,宜兴荆溪在道光十八年(1838)共有402820人,到了光绪八年(1882)仅有287911人。^②可见,太平天国战争对宜荆地区的打击非常之大,人口伤亡情况非常严重。除了人口的伤亡外,宗祠在战争中也大量焚毁,如表1中的荆溪任氏、吴家圩吴氏、萧氏、萧塘贾氏等。

宜荆地区宗族积极与太平军对抗,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这一地区宗族长期接受忠义节孝的伦理教化,忠孝观念在宗族人群中根深蒂固,他们视清廷为正统,将太平军视为“乱臣贼子”。在太平天国运动被平定后所修纂的方志和家谱中都可以看到,宗族士绅将太平军称呼为“粤逆”“贼”等。^③宜荆宗族并不承认更不支持太平天国政权,况且清政府的统治是建立在宗族基础上的专制统治,宗族与政府息息相关、两相呼应,因此在太平军攻来之时积极结乡团与之对抗,在太平军建立地方政权后也大多采取拒不合作的态度。二是由于清政府采取了加恩奖赏的鼓励措施。为了激励宗族士绅办理地方团练的热情,清政府以给与科举功名和官职等相号召。咸丰三年清廷下谕:“有能团练丁壮杀贼立功者,文武举人赏给进士,贡监生员赏给举人,军民人等赏给把总、外委。”^④在清政府政策的调动下,当地族众更极力抵抗太平军。三是太平天国客观上破坏了宜荆地区原有的宗族文化信仰。太平军将传统的儒家正统文化视为打击对象,宗族却是以儒家正统文化教化族人,把宗族祠堂视为精神圣地。但是,在太平军进攻宜荆时,曾“下令尽撤民间祠宇”^⑤。在占领宜荆以后,太平军为了在各乡建造硝厂,继续大量拆毁宗族祠堂,还“强逼其子孙自行解至厂中,以供煎硝之用”^⑥。此举与宜荆宗族文化产生了极大冲突,刺激他们走向太平军的对立面。正是由于太平天国的不适当政策,使其失去了地方宗族士绅的支持,招致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组织起来的宗族团练的坚决抵抗。

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沉重地打击了地方宗族势力,但是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宗族势力则大发展起来。孔飞力曾指出:“氏族组织和地方防御有一种复杂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如果说氏族起到了军事化的基础作用,那么同样的是,军事化也可以用来加强促进亲疏休戚与共关系的那种传统纽带。”^⑦在清政府无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时,便积极鼓励地方宗族势力兴办团练,地方宗族组织被进一步组织化和制度化。因此,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已经被大大削弱的情况下,宗族组织虽然也遭受打击,但是能够迅速恢复并进一步发展,积极参与地方社会的各项事务,成为地方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宗族在战争结束后发展自身的同时,也积极兴建毁于战争的宗祠,使得宜荆地区在清末再次出现建造宗祠的高潮,而且这种势头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

再次,聚族而居以及浓厚的宗族观念这两方面因素的推动。清代宜荆地区的宗族大多聚族而

① 参见光绪《宜兴荆溪新志》卷5《武事》,第161、195页。

② 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宜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宜兴文史资料》第3辑,1982年编印,第141页。

③ 参见光绪《宜兴荆溪新志》卷8《人物·忠节录》,第237页;朱良英主修:宜兴《粉里朱氏宗谱》卷12《重建粉里宗祠志》,民国29年(1940)刊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藏。

④ 《清文宗实录》卷84,咸丰三年二月上,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2册,第83页。

⑤ 光绪《宜兴荆溪新志》卷8《人物·补录》,第317—318页。

⑥ 周茂汜主修:宜兴《周氏宗谱》卷8《黄干周氏宗祠补记》,光绪二十年(1894)刊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藏。

⑦ [美]孔飞力著,谢亮生、杨品泉、谢思炜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79页。

居,子孙繁衍成为村落,如杨巷镇就有黄家村、马家村、赵家圩、卢家村等典型的宗族聚居村落。^①当地宗族还深受“尊祖敬宗收族”观念的影响,所以热衷于建造宗祠,且随着宗族人口的增加和宗支的迁徙,迁徙的宗支就会在迁入地建造分祠以方便祭祀。如丁蜀镇葛氏宗族共有一大两小3个祠堂,周氏宗族除宗祠外还有两个小分祠,许氏宗族共有一大一小两个祠堂。^②官林史氏共有宗祠22座,分别在义庄、北胜、集义渎等村,其中义庄村宗祠为官林史氏大宗祠。^③杨巷沈氏共有宗祠5座,其中汪洋沈氏有3座,汪洋沈氏的分支芳东沈氏和西庄沈氏各1座。张氏共有11座宗祠,其中金紫村张氏就有8座。^④宗族的支派增加,分祠的数量也随之增加。宗族拥有多个祠堂在宜荆地区十分常见。正是由于聚族而且具有浓厚的宗族观念,宗族不断迁徙并建造分祠,推动了清代宜荆地区的祠堂不断发展。

最后,多样化的资金来源起到了推动作用。清代宜荆地区的宗族虽然热衷于建造宗祠,但建祠并不是一件容易之事。萧公权曾指出:“贫穷就不可能拥有宗祠。”^⑤可见建造宗祠需要一笔不菲的资金。宜荆地区宗族祠堂建造的资金大多来源于族众的捐资及其生息的积累。任氏自南宋迁居荆溪以来,“历年几六百,代有显人而大宗祠弗建”。到了清代,任氏决定建造宗祠。顺治十四年(1657),任源祥与族兄任允淳、叔祖任尚友、侄任憬“聚米百石”生息,至十六年得米200石。为了更多地筹集资金,任景龙还写下《劝族建祠疏》,鼓励族人踊跃捐资。康熙元年(1662)任氏开始建祠,至六年建成。^⑥任氏宗祠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被太平军焚毁,同治五年(1867)任氏“按丁集腋”,在宗祠旧址集合整个宗族的力量重建宗祠,宗祠大门由宗族公建,左右门房则由二分、三分合建,九年任瑛和任鹤龄“建照厅”,十一年任重光“建享堂”,耗费六年时间才将宗祠主体建成。同治十二年任道镛“措金办寝室”,但因“工巨费绌”停建,直到光绪十年(1884)任道镛回乡“省墓谒祠,主大宗祠清明祭”,与族人商议续修,十二年秋开始兴建,“十余月而告竣”,才算真正完成宗祠的重建工作。^⑦萧塘贾氏为建造分祠,也耗费了几代人的心血。贾俊生于嘉庆五年(1800)倡议族人捐资生息,至嘉庆八年“得银百余”,但因贾俊生去世无人经理导致亏空。嘉庆九年由贾毓佩、贾奎生等清理,贾子茂接管生息,至嘉庆十五年“约有三百金”,贾子茂同族长贾惠祥商议开始建祠,但建祠过程中出现亏欠,在族人按丁捐派后,又得贾福元及贾官生的捐助,才于嘉庆十八年冬最终建成分祠。^⑧萧塘贾氏祠堂从筹集资金开始,耗费了13年的时间,在族众的积极捐资支持下才最终得以完成。但是,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贾氏祠堂遭到毁灭,祠田只剩下20余亩,宗族势力遭到严重打击,到了光绪年间才勉强恢复元气,贾氏就利用族人按丁所捐资金生息和祭

① 参见杨巷镇人民政府:《杨巷镇志》,方志出版社,2003年,第297页。

② 参见江苏省宜兴市丁蜀镇志编纂委员会:《丁蜀镇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2年,第678—679页。

③ 参见《官林镇志》编纂委员会:《官林镇志》,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96页。

④ 参见杨巷镇人民政府:《杨巷镇志》,方志出版社,2003年,第298—299页。

⑤ 萧公权著,张浩、张升译:《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台湾联经出版社,2014年,第387页。

⑥ 参见任道镛纂修:《荆溪任氏家乘》卷2《任氏大宗祠记》《劝族建祠疏》《大宗祠述》,光绪十五年刊本,美国盐湖城犹他家谱学会藏。

⑦ 参见任道镛纂修:《荆溪任氏家乘》卷2《重建大宗祠碑记》,光绪十五年刊本,美国盐湖城犹他家谱学会藏。

⑧ 参见贾洪淞主修:宜兴《萧塘贾氏续修宗谱》卷2《新建分祠记》,民国24年(1935)刊本,上海图书馆藏。

田“累年存蓄”所得的总计八百余缗钱，重新修筑并扩建了宗祠。^①在清代宜荆地区，族众积极捐资生息建祠，甚至有些族众在建祠资金不足时还踊跃额外捐献，为建祠提供了重要经济基础，推动了祠堂的发展。

宜荆地区也有少数宗族祠堂是由族内有财力者单独捐资建造，其中最著名的是明代弘治四年（1491）徐溥捐建徐氏宗祠。徐氏为宜兴望族，在徐溥父亲徐渔隐时就建有一座祠堂，但因“其地阻于池水，岁时祀事不便，且与礼制不合”，因此徐氏决定在“正寝之东”新建一座祠堂。徐溥将此事交给其弟办理，但因其父去世而耽搁，后又将此事交给其次子徐元相办理。徐氏于弘治三年七月十日开始兴建，到四年十月十二日完工，祠共“两庑十间”，所费皆是徐溥“比岁节缩俸禄所入”，在祠堂建成后还捐“常稔田二百一十二亩”作祠堂祭祀及修祠之费^②。徐溥时任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可谓是位极人臣，因此他有足够的财力独立为宗族建造新祠。徐溥之后有仿行者，清代咸丰年间，赵习朋“出千金独建宗祠”，张孟兴“独建分祠”^③。曹氏宗祠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被毁，曹槐大在战争过后“独立创建”^④。但是，独自捐资建祠在清代宜荆地区并不常见。

此外，宜荆地区还存在宗族直接使用族产修建祠堂的情况。扶风许氏自南宋迁居宜兴，世代建有家庙，但其祠堂在明清鼎革之际因战乱而毁，许氏宗族将其“整而葺之”，但“卑隘琐漏”，直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族长提议新建祠堂，“给公银百三十两，收赎庶孙维扬之宅改作公祠”，但因用料太差，导致“未十余稔旋即朽败”，又于雍正十年（1732）族长决定用“赎屋后所积公资”采买材料先建“中堂五楹”，历时两月在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建成，此次修祠耗“银百九十九两有奇”^⑤。在修祠过程中，因缺银还将“金字祠田八号共平十亩有零”卖出作为建祠之费。^⑥吴家圩吴氏宗祠报本堂是由其前族长吴珩璠于乾隆八年（1743）“以公资购基”，乾隆九年建成。^⑦宗族直接利用族产建造祠堂需要一定的经济为基础，但是宜荆地区宗族在太平天国运动中遭受重大打击，战后的宗族很少有财力可以独立完成宗祠的建造工作。所以，宗族利用族产建祠在宜荆地区比较少见，而且一般只存在于太平天国运动之前。相比较而言，宗族族众的积极捐资及其生息是清代宜荆地区祠堂发展的最为重要的经济基础。

正是由于朝廷支持祠堂发展的政策与当地宗族的建祠需求之间的积极互动，以及族众普遍捐资参与，才使得清代宜兴荆溪地区的宗族祠堂在遭受明清易代和太平天国时期战争的两次沉重打击之后，仍然能够恢复重建并获得进一步发展，从而呈现兴起、持续发展、掀起高潮、跌入低谷、再次掀起高潮的发展态势。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参见贾澹淞主修：宜兴《萧塘贾氏续修宗谱》卷2《重建家庙记》，上海图书馆藏。

② 参见徐氏世德堂编：宜兴《世珍集》卷3《新建祠堂记》，光绪三十三年（1907）刊本，宜兴市档案馆藏。

③ 光绪《宜兴荆溪新志》卷8《人物·义行录》，第273—274页。

④ 民国《光宣宜荆续志》卷9中《人物志·义行》，第531页。

⑤ 许继德主修：（宜兴）《扶风许氏宗谱》卷2《新建祠堂记》，民国37年（1948）刊本，宜兴市档案馆藏。

⑥ 参见许继德主修：（宜兴）《扶风许氏宗谱》卷18《扶风桥祠田志》，民国37年刊本，宜兴市档案馆藏。

⑦ 参见吴之藩纂修：（宜兴）《吴家圩吴氏宗谱》卷1《报本堂记》，民国26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